



春节忆

周延婉


春节临近,在周围年味渐浓的气氛中,不禁勾起我童年在家乡过春节的回忆,昔日的过年情景历历如昨。

我生长在琼海乡村,离中原镇有六七里路程。在我的印象里,农历腊月二十日过后,附近村子里的人都赶到镇上来置办年货,包括干菜、鞭竹、红烛和金银香纸之类的祭品。尤其是农历二十九这一天,街道上和店铺内到处是人潮,熙来攘往,热闹非凡,街道两旁更排满了年货摊位,挤得水泄不通。

除夕日,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忙开了。我家是个五口之家,母亲、祖父、祖母和我,父亲在我三岁时已下南洋谋生。这天大清早,母亲和祖母就忙着宰鸡、杀鸭、煮饭做菜,祖父则忙着整理神案和烧香点烛,拜祭祖宗的事。敬神完毕,一家人高高兴兴围炉吃了一餐丰盛的年夜饭。这餐饭吃过后,母亲和祖母又不停歇地擦窗扫地,清灶腔,祖父则忙着在每扇门上张贴春联和年画,表达辞旧迎新、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当天晚上,才真正进入春节佳境。这时整栋房屋灯烛辉煌,大厅八仙桌上摆满了象征吉祥的柚桔和干果一类的贡品。母亲和祖母还要忙着煮年夜饭和做年菜,因为按照家乡风俗,初一不开火,不动刀砧,初一的饭菜都要在除夕夜做好。

初一早上,天蒙蒙亮,我们一家在村里一片劈劈啪啪的炮竹声中,祭拜祖先。我接着向祖父祖母叩首拜年,二老赏赐我压岁钱,我满心高兴说了声“谢谢!”然后全家团聚吃早饭。这餐吃的全是斋菜。从这天早上起,村子里无论男女老幼全部穿上新衣裳,彼此笑脸相迎,恭贺新禧,村中到处洋溢着温馨平和的氛围。这一天,村内还循例各家彼此拜年、小孩子给长辈拜年,长辈则赏赐红封。打新年初二起,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,手里拎着桔子橙子之类的礼品,走亲访友去拜年,互相传递着美好的新春祝福。村中家境较好的还彼此宴请春酒,或宴请亲戚朋友时邀左邻右舍作陪。村子里如有过门(结婚)尚未满一年的新娘,还要到每家每户向长辈叩首敬槟榔,长辈则赏赐红封。亲族家里还要请新郎新娘吃午饭。这种新年欢乐的气氛过了初五才逐渐递减,到元宵节才冷下来。按海南习俗计算,从腊月二十九一直到新年的正月十五,将近四十多天的时间,都属于春节期,春节是中国人最长的节日。

综上所述,显见得春节不仅仅是一个年序更新的节日,更重要的,是其蕴含着深厚的敬亲睦族尊长抚幼的伦理意义,它代表着中国社会敬奉祖先的广泛民族信仰,更配合着农业社会农民作业的程序。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。

这些年一直有很多人感慨,年变短了,年味愈来愈淡了。确实,不少习俗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消失。但人们对“年”的珍视并没有变淡,可能还更浓了。“年”就像一块巨型的感情磁石,离家在外的人不管路途多么遥远,都要日夜兼程赶回家中过年。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强烈的符号,已经内化于心,融入我们的血液,它将代代传承下去! 

办年

徐建华

湖北老家把所有为过年而进行的采购活动统一叫做办年。农历腊月十几的时候,人们遇见了,会问:开始办年了吧? 答:冒呀,还早呢。到农历腊月二十之后,年办得热火朝天的,人们遇见了,会问:年办齐

了吗? 答:差不多了,将就将就过吧。“将就将就过”只是客气的说法,其实,进了腊月人们就为办年忙开了。1970年代,我还是儿童时,对家里办年就有了深刻的印象。

要扯布或用家织布请裁缝做衣服。当年农村很少有人买衣服穿,各家各户年前请裁缝师傅到家里,给一家老小都做新衣服过年穿。师傅一天可以做十几件衣服,样式没有什么讲究,大人总是叫师傅把小孩子的衣服往宽大里做,一件衣服是要穿很多年的。做工的质量有保障,针脚做的是又密又匀。有时候一家的衣服太少,不够师傅做一次工,也可以两家合着请师傅。常常是一村子里几十户人家请的是同一个师傅,所以要轮着来,有时安排不过来,年三十裁缝师傅还在忙,影响裁缝师傅家团年,总是过意不去的。

有一年,临近年时的某天清早,我家早早起来洒扫堂屋、搭上裁衣的案板、做好早餐,等着请好了的裁缝师傅来家里做衣服。可左等右等师傅没有来,待看到他挑着缝纫机来了,我在门口高声呼叫时,他径直挑着担子到村里另一家去了,完全忘记了他与我们家的约定。这件事情让我们兄弟姐妹们很沮丧,看到裁缝师傅从门口头也不回、一声不吭地走过,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们穿新衣服过年的希望给带走了。过了年后,我家在正月初十左右又请另外一个裁缝师傅来做衣服,如此,我们到正月十五那天终于能穿上新衣服。记得我穿着家织的粗布做的新衣服,在门口蹦蹦跳跳时,伯母看见了,逗我说:“哎呀! 建华穿新衣服了,好俏呀!”我心里激动,偏着头去看妈妈,只见她噘着嘴巴有些生气的样子,我知道,她是对年前的裁缝师傅失约、导致孩子年后才穿上新衣服的事情耿耿于怀。

要买猪肉、买鱼。那时不象现在物品如此丰富,鱼、肉都是凭票供应,每到年关



过年时的经典画面

常常供不应求,不提前做准备会很被动。老家过年一定要吃肉糕,鱼和肉是做肉糕重要的材料,没有它们做不了肉糕,没有肉糕吃的年那真不叫过年,因此买鱼买肉也是办年的一件大事。


记得有一年过年我们家没有买到鱼,父亲天天去托人帮忙,说大人吃不吃没有什么,要是买不到鱼做不成肉糕,细伢不好办。我一想到过个年连一块肉糕都吃不上,简直就要哭起来。后来,总算有人在腊月二十八夜里,还穿着打鱼的塑料衣裤,给我家弄来了两条鱼,大约有好几斤呢。当时,一家人喜笑颜开、感天谢地的样子我还记得,父亲给人钱,给人献烟,说着有劳、辛苦等感谢的话,感谢他让我家在过年时能吃上了肉糕。我听着鱼在大水桶里拍水的响动,很晚都睡不着。

还要买木炭、买一些时蔬及其它的东西。平时家里是舍不得用木炭烤火的,过年时亲戚们会相互走动,大冷天家里烧一盆炭火,既热闹又暖和。桌上的菜品也容易冷了,须要备一些炭炉一边加热一边吃。过年时节的蔬菜都是红萝卜、白萝卜、大白菜,也要到集市上去买一些大蒜、藕、鲜辣椒,以丰富餐桌上的菜的品种。

那时候,父亲天天起早去赶集,今天

提几斤炭回来,明天提几节藕回来,后天提一把大蒜和几个红色与绿色的辣椒回来。和这些东西一起被父亲带回家的,还有我和二姐的新袜子,新红头绳,写春联的红纸,等等。东西虽然不多,但一年也就是过年才得见,在我们眼里已经是相当丰富了。关键是每一样东西都传递着将要过年的信息,令人欢欣鼓舞。

其实,即使是用家织粗布衣服,即使只有两条鱼,即使只是几斤炭、几节藕的春节,对当年的父母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父亲连续早起冒着严寒去赶集,是想尽可能地增大他手中有限的钱的购买力,不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精打细算,才用那有限的钱让我们穿上新衣,让我们吃上肉糕,让我们吃上藕,还能够让我们穿上新袜子、扎上新红头绳的。记得有一年父亲对母亲说:年还没有办好,25块钱花的差不多了。

办年,其实是辛苦一年的父母,年终又一次为孩子们快乐而操劳。 

贴对联

钱续坤

时间才过晌午,年味四溢的安徽乡村就有鞭炮声响起。做事从来不甘落后的祖母,一边催促擅长书法的伯父赶紧去写对联,一边指挥着我们研好墨、备好糊、搭好梯。所有的工作准备得当,太阳离西山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,祖母可不管那么多,“快贴,快贴”的命令,使得顽皮的我们开始手忙脚乱起来,同时也欢欣鼓舞起来。

“左右对付,仄起平收!”在堂屋里还一直在挥毫泼墨的伯父大声地叮嘱道。年龄稍长的我心领神会,像猴一样“嗖”地爬上搭在屋檐的木梯,首先将上联“喜居宝地千年旺”贴在大门的右侧,然后折转到大门的左边,将下联“福照家门万事兴”举在手中,听着站在庭院中央的父亲的指挥:“再上一点,靠边一点!”祖母依旧很不放心,她眯缝着眼,背着手大声地召唤:“快,快把横批贴上!”


身穿新衣的弟弟欢天喜地从堂屋里跑出,他手中跳跃的四个大字,是父亲对新春最诚挚最朴素的心愿:幸福,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;祥和,是对美满家庭的期盼。

仅贴大门肯定是远远不够的,在乡村,即使是厨房、牛栏、猪圈,在过年时也必须贴上红红的对联。“柴米油盐此房内,人生百味我心中”“玉鼠回宫传捷报,金牛奋蹄涌春潮”“多吃多睡多长膘,有精有肥有销路”等等雅俗共赏的联语,俨然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,吸引着练字习文的孩子前来评头品足。

我把对联刚刚贴好,就清晰地听见对面的树梢上,一对留守的喜鹊正在生动地啁啾;原来,我家的墙上有不少“鸟雀”也筑起了“新巢”——那草体的鸟儿,那隶体的鸟儿,那篆体的鸟儿,那宋体的鸟儿,在一片氤氲的红光中扇动着美丽的翅膀,把瑞气和喜庆荡满了屋梁,把愉悦与吉祥漾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。

祖母自然不知道这些鸟儿是什么形体,但是传统的民间习俗在她的心中根深蒂固,她看到所有的对联张贴妥当,这才从阁楼里拿出那两盏大红的灯笼,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对联是年的眉毛,灯笼是年的眼睛,除夕是年的嘴巴……”

那时并不知道这是比喻的辞格,不过年的“眉毛”始终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我知道,那“眉毛”始终是舒展的,那“眉尖”始终会洋溢着喜气。

又到除夕,又见对联。无须用言语表达此时的心情,我深情地凝视,真切地感受到煦暖的春风,正从那一副副红对联上袅娜地升起;我知道明天一早起来推开大门,会惊喜地发现:乡村的面颊又是一片潮红。 

闲话文人

明斋

瞿秋白,为衔春色上云梢

1899年1月29日,瞿秋白先生于江苏常州出生。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,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,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理论家和宣传家,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。

瞿秋白于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,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前锋》,参加编辑《向导》杂志;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、五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、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,成为中共领袖之一;1927年2月7日,自编《瞿秋白论文集》;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、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;红军主力长征时,瞿秋白因患肺病,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,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。

1935年2月,他的肺病日益严重,中央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,2月24日,当他们走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,被当地武装保安团发现,突围不成被捕,当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,职业是医生,任凭敌人严刑逼供,坚不吐实;4月初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获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之妻徐氏,供出了瞿秋白已在长汀县被俘的情报,国民党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,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瞿秋白,又让被俘的、曾当过收发员的叛徒郑大鹏在暗处指认,证实化名为林祺祥者确系瞿秋白。1935年5月9日,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,在被押期间,他写下了《多余的话》,表达了由文人从政的曲折的心路历程。6月18日晨,他写完绝笔诗后,坦然走向罗汉岭刑场,沿途用俄语唱着《国际歌》,用中文唱着《红军歌》,时而高呼着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“共产主义万岁”等口号;到达刑场后,环视一下周围景色,从容道:“此地甚好!”然后盘膝坐在草坪上,饮弹洒血,慷慨就义,年仅36岁。

瞿秋白多才多艺,尤喜文学,在诗词、散文、小说、评论以及篆刻、绘画等方面,均表现出了卓越才华;他同时精通俄文,翻译过多部俄文文学名著,还喜欢音乐,善吹箫,能唱昆曲,实属全才罕遇之人。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瞿秋白,其短暂的一生中,日常事务异常繁重,但他知识渊博,才华横溢,每抱病工作,常夜以继日,惜时如金,争分夺秒,在许多领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,无论是他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,还是涉及政治、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翻译等众多领域的文化建树,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瞿秋白就义之后,鲁迅先生亲手编辑印行了他的译文集《海上述林》上下两卷。因为瞿秋白名霜,鲁迅便采用“诸夏怀霜社”的名字印行,选取当时最好的道林纸和装帧予以印制,并亲自为其撰写了发行广告,以此表达对这位文坛“知己”的深深怀念。1950年12月31日,毛泽东主席在为《瞿秋白文集》所作的序言中,高度赞扬他说:“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,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,不愿屈服。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,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,将永远活着,不会死去。”

瞿秋白曾有诗作《江南第一燕》传世,云:“万郊怒绿斗寒潮,检点新泥筑旧巢。我是江南第一燕,为衔春色上云梢。”此诗咏燕,亦自咏也。 